

# 中德建交亲历记

从记者到大使

王 殊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前 言

这本回忆录是为纪念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30 周年写的。两国由于种种原因建交较晚,但在 1972 年 10 月建交以后,两国关系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就两国贸易额而言,从建交的当年只有 2.7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00 年的 296.9 亿美元之多,其他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我国同作为经济大国的联邦德国建交,是我国解放后一系列重大外交决策之一,受到了各方面很大的关注。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以及邓小平、朱德、李先念同志等都还健在。他们对推动两国建立正常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周总理更是周密考虑,亲自安排,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外交和外事人员正在加快更新换代,他们对解放后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决策包括中德建交在内,可能已不太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因此,重温当年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本回忆录主要是想让我们的同志了解我们老一辈的领导人当时怎样观察国际和地区的大局,怎样判断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又怎样灵活运用外交策略 ,怎样推动预定的外交目标得以完全实现 ,从而发扬我们外交艺术的传统 ,进一步推动我们国际关系的顺利发展。

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感到对外交和外事工作了解很少 ,甚至觉得很神秘。过去 ,因担心和防止泄密 ,对外交和外事的一些回忆文章和著作等规定甚严。在“文革”的极“左”思潮泛滥下 ,我们的工作竟成了“卖国主义” ,闹了很多的笑话 ,也出了不少的错误。从改革开放以来 ,这方面已有了不少的改善 ,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和著作已经多了起来 ,但仍然数量太少 ,过于零碎 ,也不够系统化。到现在还没有一本有关外交和外事工作的报告文学、小说、戏剧和其他文艺创作 ,除了一些记录片之外 ,也还没有一部电影、电视片。对关心我们工作的同志来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点。当然 ,外交和外事工作有很大的机密性 ,应高度注意保密。可是 ,在这个大前提下 ,也应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工作 ,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因此 ,这本回忆录也是想让同志们从一个侧面 ,了解我们老一辈的领导人怎样为我们创下了外交事业的基础 ,而且介绍一些我们外交和外事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其实 ,我们的工作同其他的工作一样 ,做调查研究 ,观察形势变化 ;生活也与其他同志一样 ,紧张辛苦 ,简单朴素。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合作将大为增加 ,对外交往也将进一步开展 ,对外关系将变为复杂 ,涉外事务处理的难度也将增大。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高兴之余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 ,努力缩短并且最终弥补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 中德建交三十年

时光飞逝,到2002年10月11日,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就有30周年了。两国关系已到而立之年,相信今后会得到更稳定和成熟的发展。当时双方不少参与其事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其中有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和德方的施罗德、施特劳斯、勃兰特先生等,都已先后逝世了,还有不少的人,包括德方的谢尔总统、施密特总理等,也都退休了。但是,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高瞻远瞩,对两国关系的深入判断和对外交策略的正确运用,始终铭记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时候回顾30年前两国建交的历程,特别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亲自安排,对进一步做好工作、促进两国关系的更大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我在建交之前担任新华社驻波恩记者,根据采访中了解的情况曾向国内写了几个内部报告,周总理、毛主席看到后都作了批示,认为有研究的价值,并且在我回国时接见了。在建交谈判开始以后,我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建交后我调任为我国驻联邦德国参赞,后来又继任大使。因此,我有幸参与了建交前后的工作,学习到了很多外交外

事方面的知识。现在虽然 30 年已经过去 ,我也已进入古稀之年 ,但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难以忘怀。我觉得 ,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应是我的责任 ,可能对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同志会有所帮助。

我在建交的过程中首先感到的是 ,在对外工作中 ,洞察形势、抓住时机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形势是 ,从 1971 年 4 月中美“乒乓外交” ,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到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 ,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 ,互换了联络处 ,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同时 ,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同很多国家建交 ,打开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因而 ,在国际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形势 ,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与我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为此对美国有很大意见 ,因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影响的结果 ,而现在美国又没有把对华政策的改变事先通知他们 ,以致造成了他们在外交上的被动 ,同中国的关系落到了别人的后面。在中国方面 ,毛主席、周总理在打开中美关系后 ,对同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也很关心 ,而且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 ,有可能与之很快建交。因此 ,双方都有意愿也有可能建立正式的关系。

但是 ,在联邦德国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民主党在 1969 年 9 月的大选中取得了胜利 ,同另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首的联合政府 ,接替了战后执政了 20 年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勃兰特政府上台以后推行新东方政策 ,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内部关系。鉴于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 ,他们担心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可能影

响这一政策的实行,因而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第二位,采取了先苏后华的政策。可是,成为反对党的联盟党从党派斗争出发,主张应同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到北京来同我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周总理高瞻远瞩,一反谈建交问题首先同政府接触的常规,决定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打开了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建交的道路。结果与原先的估计完全一样,在中国同日本建交差不多的同时,中国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在外交外事工作上的判断和决策应该建立在认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可靠基础之上。老一代的外交和外事工作者都知道,周总理在领导国内外的工作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常常召集各外事部门的同志包括负责人和主管的干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且鼓励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在开会时或见外宾前,常常就国际形势和国别情况提出一些问题来考问参加会议和接见的同志,谁若答不出来还要受到批评,也有个别答得太差的甚至被免除了职务。周总理多次说过,国际局势变化很快,而且虚虚实实极为复杂,要注意跟踪研究,深入调查。要总览全局,不要受一事一处的表面现象的迷惑,而且要提倡不同意见,广泛听取意见,切忌人云亦云,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当时,在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西方有些报刊和人士幸灾乐祸地认为,苏联将会战略东移,进攻中国。毛主席总览全局,认为欧洲是块肥肉,美苏都不会也不能放弃,指出苏联战略不可能东移,而是同美国争夺欧洲,甚至可能迷惑西方,声东击西。

外交外事人员在调查研究中,当然要重视报刊和其他

文字的材料,应该认真阅读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驻外人员要加强对外活动,结交各界人士,取得活的材料,发现新的动向。周总理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不少外国领导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谈到,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常常向他们提出很多本国和本地区的问题,有时弄得他们狼狈不堪地答不出来。当时,还是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严重,很多同志不仅不敢大力开展对外活动,而且害怕接触上层人物,特别是右翼人士。周总理批评这些不正常的现象说,右派人物大都是当权派,你们不同他们往来,不去了解他们的想法,能够了解情况、做好工作吗?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我就是喜欢右派,你们把他们都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也是同他谈过的,谈得还不错。周总理和毛主席拍板邀请联邦德国的一些右翼人士到北京访问,亲自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开辟了两国建交的道路。

我本来长期做新闻工作,对外交工作毫无经验,两国建交后成了外交官,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的感觉是,记者工作当然与外交外事工作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力开展对外活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把这些得来的材料和印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反复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提出有研究价值的看法。新华社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同志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变化时,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对这些变化的看法和建议,因而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表扬的有过不少,而受到有关部门采纳的更多。同样重要的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看法以后,也有可能同某个部门或某些同志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这就需要反复研究,深入讨论,不能自以为是,意气用事。但如果确认自己

的看法正确 ,符合客观实际 ,就要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 ,直到事实发展的证明 ,不能看领导的眼色行事 ,更不能见风使舵。当然 ,也时常会有不正确、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那就要服从真理 ,修正错误 ,绝不推诿和掩饰。这对自己来说 ,也是得到一个长进 ,增加一个经验 ,对以后做好工作是有益的。总之 ,把调查研究做好 ,并不容易 ,要有客观、认真、仔细、慎重的精神 ,也要有认真、踏实、负责、顽强的态度。

## 中德之间的第一件大事

30年前,1972年10月11日上午9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里来,对这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中国、联邦德国的记者都早已等候在那里,准备采写中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第一件大事。双方为了加深两国建交的重大意义,商定两国外长先签字再会谈。我国外长姬鹏飞在大厅门口同早一天到达北京的联邦德国外长谢尔握了手,径直走到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旁,在摄像机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为两国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谢尔是联邦德国的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后于10月10日下午到达北京。双方对这次访问都很重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亲自安排了接待方案,德方也派遣了由39名成员组成、29名记者随行的庞大代表团,并事先派出了先遣组。随后,两国外长走入会议厅进行了简短的但意味深长的谈话,谢尔对姬鹏飞的邀请表示感谢,说他能够作为联邦德国政府的第一个领导人访华,并在建交公报上签字感

到十分荣幸和高兴。姬鹏飞也对他说,我们签字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反映了我们两国1949年以来特别是这两年加强接触以来共同的努力,在这20多年中我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没有接触到有接触,终于在今天完成了建交的大事,我同你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李先念副总理下午同谢尔外长举行了会谈。谢尔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十分重视两国正式建交关系,希望今后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李先念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相信双方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加强。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谢尔及其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让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和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乐队演奏了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是第一次恢复演出,使客人感到非常震惊,西方记者更是作了大量的报道。其实,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他很重视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依照他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有关单位的会议,检查接待谢尔外长的准备工作。在结束时,他突然提出,在欢迎晚会上是否可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大家对他在“文革”的滚滚寒流中提出演奏《欢乐颂》,先是大吃一惊,后来感到了他的用意,一致表示同意。他就要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的李德伦同志是否能演,李说乐团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而且很多人也已去了干校,在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曲,但他建议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总理同意了 this 建议。在这之后,在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又恢复了演奏他们国家音乐家的作品,终于引起了“四人帮”

的恼怒。不久，“四人帮”发动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

在13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谢尔外长。周总理谈了对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的看法后说，两国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今后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可以合作的方面很多，特别是经济科技方面。他指出，联邦德国始终没有同台湾建交，这是已故总理阿登纳的有远见之举，令人钦佩。他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在两国建交谈判代表草签建交公报、谢尔外长应邀访华之前，在波恩的台湾分子以“自由中国新闻处”的名义，邀请德国各界人士和华侨参加他们“双十”伪国庆的招待会。我国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同德方进行了严正的交涉，德方采取措施迫使台湾分子不得不取消了招待会。

周总理在谈到德国问题时说，德国问题应按照两个德国的人民的愿望，由两个德国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协商解决。他还表示，中国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谢尔对我国支持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表示感谢。西德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新政府1969年成立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大力改善同苏联、东欧和同民主德国的关系，两个德国也拟订了同时加入联合国的计划。西德估计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投反对票，但中苏关系恶化，西德同我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它也感到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谢尔这次访问的目标之一也是要试探我国的立场。

当天晚上，谢尔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德方对在北京的第一次正式宴会很重视，所有的食物、酒类和饮料都是从德国用飞机冷藏运来的，还派来了获得金奖

的厨师长烹调真正的德国大菜。李先念副总理及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宴会。德方邀请了很多的中国客人,但可能由于对中国没有足够了解,也由于德国人拘谨的作风,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一再邀请周总理出席,因而错过了再次同周总理晤面的机会。其实,周总理从两国关系考虑,曾告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如果德方邀请,他是准备出席的。中国客人自“文革”以来对西菜已是久违了,虽然冷藏运来的德国大菜不怎么样,仍吃得津津有味。德国厨师长按照德国的习惯,在宴会中间到大厅来向贵宾征求对饭菜的意见。中国客人对他戴的厨师的又高又大的白帽子暗暗好笑,因为在“文革”中造反派就是给“走资派”戴上这样的大帽子拉去批斗的,而且不少人在“文革”初期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是不知做了多少次检查后才在不久之前“解放”的。

谢尔外长在北京访问4天后于15日回国。本来我们邀请他到外地看看,他表示感谢,说这次访问印象很深刻,也想多看看,但因为国内大选在即,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只能留待下一次了。他说,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仍能保持进入联邦议会所必需的5%以上的选票,他还将到中国访问。自民党是一个小党,但在两个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议会中都得不到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就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可同大党组成联合政府。自民党过去长期同联盟党组织政府,1969年大选中社民党超过联盟党成了第一大党,自民党改变策略,同社民党组成了政府。联邦德国宪法规定,所有政党在大选中都必须取得5%以上的票数才能进入联邦议会。

## 往事回首

谢尔外长访问结束后,我就到外交部办了手续,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我被任命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在12月1日作为临时代办率建馆小组到达波恩筹建使馆。不久,双方都任命了老资格的大使,我方是王雨田同志,德方是保尔先生。从此,我离开已工作了24年的工作岗位,成了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我原来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波恩的记者,在1969年12月去那里工作的。解放后,我先后在朝鲜、巴基斯坦、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担任过常驻记者,在国外工作了15年。新华社在1958年同西德的德意志新闻社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并在波恩建立了新华分社。长期来,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中国的机构。所以,我到波恩后,除了新闻报道外,还要做好外交上了解情况和转达联络的工作。我先后就欧洲局势和两国关系给国内写了几篇报告,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我在1972年7月中旬回京时周总理同我谈了多次,毛主席也接见了。8月,两国决定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外交部照会德方任命我为中方的谈判代表。谈判结束后,周

总理又指示调我到外交部工作。我回国参加接待谢尔外长访华时,已不能再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可在外交部内还没有名义。部内一些同志为我用什么名义费了很多的脑筋,拟议了好几个方案都定不下来,最后只好仍用“谈判代表”的名义。虽然谈判早已结束了。有的德国记者不了解,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要谈。这是我到外交部后遇到的第一件事,过去在新华社不管大小都是记者,没有名义的问题,现在成了“官”,就有名义的问题了。当然,我也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我到波恩分社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工作,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情况很复杂,变化也很快,国内极为重视和谨慎,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同志处理两个德国的事,局外的人一般是不过问的。因此,1969年10月新华社军管小组的负责同志通知我去波恩分社工作,并且要在年底之前赶到,使我大大感到意外和吃惊。那时,新华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正在逐步恢复在“文革”中由于主要记者全部调回而陷于瘫痪的国外分社,我已知道领导仍要派我到国外工作,但估计是到我熟悉的英语或法语的国家去,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去联邦德国。军管小组的同志向我解释,现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波恩只有新华社一家,不能没有记者在那里。我出国手续已全部办好,要找德语的记者已来不及办理手续,因此我要先去顶一个缺,等以后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再去接替我。我深知办出国手续的困难,当时“文革”正在进行,极“左”思潮泛滥,原来的干部处已经“打倒”,成立了一个人

数很少的工作小组 ,不仅要对记者的历史、经历、思想、言行进行审查 ,而且还要对他们上下左右三代的关系全部搞清 ,所以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多 ,才能审查完毕 ,再决定能否出国。我虽然觉得这个岗位不太合适 ,但考虑到实际的情况 ,而且我是“文革”后派出的第一个老记者 ,应该接受并且尽快赶到那里去。那时 ,出国前要参加学习班四个星期 ,白天学晚上也要学 ,在业务上已没有多少时间来做准备 ,而且许多书籍特别是外文书籍“文革”以来都已封存或者销毁 ,我只是抢很少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到波恩去。我赶到那里时 ,已是 1969 年最后一天的中午。

我这次出国距上次回国已有四年多了 ,回忆起来不免感慨万分。1964 年我从古巴回国 ,本来要我去南美担任常驻记者 ,但好多国家都不给签证 ,因而到四川去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 ,后来又要我去英国伦敦 ,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 ;“文革”就开始了。我一下子成了新华社“黑帮”的“红人” ,而且还是“三反分子” ,在社内的劳改队劳动了整整两年。后来 ,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证明我不是叛徒特务 ,只是出身不好 ,受了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 ,终于得到“解放” ,恢复了工作。我已万念俱灰 ,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出国工作。中共“九大”召开以后 ,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驻墨西哥记者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同志说 ,他早已回来参加“革命”了。周总理很气愤 ,批评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当时 ,绝大多数新华社国外分社的记者都已回国 ,有些分社空无一人 ,有些只有个别翻译、报务员或者工勤人员看家。周总理责成新华社军管小组负责人立即派出记者 ,恢复国外分社的工作 ,并且在派出的记者中要老中青

三结合。我那时 45 岁 ,当记者已有 20 多年 ,所以是老记者了。我知道这次再被派到国外工作很不容易 ,阻力是很大的。在国际部领导成员(“ 文革 ”后称为“ 勤务员 ”)的会议上讨论我到国外工作时 ,一个造反派“ 勤务员 ”说 ,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上山下乡三年 ,再派到国外去才行。另一个过去同我相当熟悉的老编辑还写信给军管小组 ,说不应让这样的“ 三反分子 ”出国 ,甚至还有人控告我是什么“ 五一六 ”分子。我感到这次出国同过去有很大不同 ,不仅对我自己有很重要的意义 ,而且将为更多的老同志能够出国工作创造条件。很多老记者看到我终于得到通过非常高兴 ,向我祝贺 ,鼓励我到国外后努力工作作出新的成绩。我也表示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虽然困难很大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 内 外 情 况

我在 1969 年底离开北京到波恩时 ,内外情况都是很困难的。“文革”的大破坏已达到了高潮 ,打内战不断升级 ,很多城市和地区处于混乱状态 ,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 ,群众的不满意越来越大。新华社内部两派的斗争也日益激烈 ,双方刚刚捉过叛徒、特务、反动文人 ,又追查“五一六”分子 ,很多干部被批斗、挨打和关押 ,气氛十分紧张。同时 ,在国际上 ,除了美国的敌对外 ,苏联大军压境 ,1969 年 3 月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的事件 ;“四人帮”的走卒甚至叫嚷什么“要准备美帝苏修一起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士和报刊纷纷幸灾乐祸地推测苏联要改变战略进攻中国。苏联的战略究竟是继续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 ,还是转而向东进攻中国 ,在国内外都有不少不同的议论。中央发布第一号命令 ,把大批干部及其家属在短短几天内放逐到很远农村里的干校去。很多在第一批名单上的同志及其家属哭哭啼啼收拾行装 ,变卖家具 ,悲惨的情况目不忍睹。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 ,新华社也有很多同志及其家属到山西的干校去 ,很多同志到车站去送行 ,站